

## 【历史研究】

# “干没荣利,得不以道”:入隋南人术艺化之表现、特征与缘由

王永平

**摘要:**隋代南人多有从事术业者,成为一个特殊群体,颇为活跃。就其术艺类别而言,阴阳、卜筮、医巫、音律、相术、技巧等皆有代表人物,在隋文帝、隋炀帝的诸多军政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揣摩上意,奉承其旨,政治品格佞幸化,因而“待遇甚厚”,屡受封赏。在南北文化整合的历史背景下,诸人多有传输江左伎艺、融通南北之表现。这些术艺化南人多出自南朝士族,之所以“得不以道”,主要在于作为“亡国之余”,入隋南人普遍受到以关陇旧族为代表的北人的排抑,隋文帝、隋炀帝“雅信符应”,以致一些投机之南人以术艺附合,“干没荣利”。

**关键词:**隋;入隋南人;术艺化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8-0121-08

隋朝南来人士,依其入北时间,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西魏—北周征服萧梁而入北之南人,如西魏灭蜀地萧纪、灭江陵梁元帝,俘获相当数量的萧梁宗室与士族名士,其中多有入隋者;二是原本流徙东魏—北齐的萧梁宗室与南士,周武帝灭齐后相继进入关中,后亦归隋;三是隋取缔后梁傀儡政权,后梁宗室及士族群体迁徙关中;四是隋灭陈,陈朝宗室及其士人群体入隋。考察入隋南人之活动,其中多有以术业显达者。《隋书》卷六九“史臣曰”对袁充“委质隋朝,更以玄象自命”,“要求时幸,干进务入”,深表不解,故有“充乃江南望族,干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良可叹息”<sup>[1]613,614</sup>之语。袁充可谓入隋南人术艺化之典型,其他南人也多有相关表现。有鉴于此,本文就入隋南人术艺化群体之表现、特征及原因略作专题考论。

## 一、入隋南人术艺化之代表及其表现

《隋书》卷七八《艺术传》主要包括阴阳、卜筮、医巫、音律、相术、技巧等门类,《北史》卷八九《艺术传》序言称:“先载天文数术,次载医方伎

巧。”<sup>[2]2923</sup>两书所载入隋术艺化南人颇多。在此先分别考叙各类入隋南人以术艺显名之代表人物及其相关活动。

### 1. 天文星占类南人代表

庾季才,“十二岁通《周易》,好占玄象”,梁元帝“重其术艺”。梁亡后入北,得宇文泰器重。周、隋之际,庾季才以术数投附隋文帝,主要有二事:一是助其称帝,大定元年(581年)正月,庾季才进言,“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隋文帝从之。二是助其迁都,开皇初“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愿陛下协天之心,为迁徙之计。’高祖愕然,谓颎等曰:‘是何神也!’遂发诏施行”。此后,庾季才因“术艺精通”,深受宠信,“所有祥异,常使人就家访焉”<sup>[1]1764-1767</sup>。

庾质,庾季才子,隋文帝时受命随其父“撰《垂象》、《地形》等志”,隋炀帝大业初为太史令。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庾质以为“伐之可克”,然“不愿陛下亲行”。大业九年,隋炀帝再征高丽,又问“今段复何如”?庾质表示“臣实愚迷,犹执

收稿日期:2022-04-02

作者简介:王永平,男,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扬州 225002)。

前见”<sup>[1]1767</sup>。杨玄感变乱,炀帝又问“荧惑入斗如何?”庾质表示:“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谢,终必无成。”可见大业年间,庾质参与了炀帝东征高丽与平定杨玄感之乱等重大军政事件。庾质子庾俭,“亦传父业,兼有学识”<sup>[1]1768</sup>。

袁充,出自陈郡袁氏,及陈灭归国,“充性好道术,颇解占候,由是领太史令”,深得隋文帝信重。袁充在隋文帝时以天文玄象预朝政主要有三事:一是附和隋文帝行太子废立;二是编造“隋兴已后,日影渐长”之瑞应天象;三是编造“上本命与阴阳律吕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以附会隋文帝个人及其国运皆“永永无穷”。隋炀帝继位,他与太史丞高智宝奏言:“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劝“齐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贺”。此后袁充完全以天文附和帝意,如以“荧惑守太微者数旬”,时值“缮治宫室,征役繁重”,袁充上表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以至“百僚毕贺”。隋炀帝后期,“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对隋炀帝之建设东都、频繁巡幸、征伐辽东、民变世乱等一系列重大军政举措,袁充皆“假托星象,奖成帝意”<sup>[1]1610-1613</sup>。

周坟,陈尚书右仆射周弘正子,陈时官至吏部郎。“高祖平陈,得善天官者周坟”,“以坟为太史令”<sup>[1]504,505</sup>。

耿询,《隋书·艺术传》载,“时有卢太翼、耿询,并以星历知名”。耿询来自江南,隋炀帝继位,耿询“进欹器,帝善之”,“及平壤之败,帝以询言为中,以询守太史丞”。耿询“伎巧绝人”,擅长器物制作,《隋书》卷七八称“耿询浑仪,不差辰象之度”,堪称“一时之妙”<sup>[1]1768-1786</sup>。

高智宝,由耿询“见其故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史,询从之受天文算术”可知,高智宝为耿询“故人”,当来自陈朝,精于“天文算术”,入隋后“以玄象直太史”<sup>[1]1770</sup>,隋炀帝继位后,他附和袁充奏“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

## 2. 阴阳卜筮类南人代表

萧吉,为萧梁宗室,“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萧吉以阴阳术数侍奉隋文帝,“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隋文帝独孤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萧吉上表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今黑气当冬王,与姓

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隋文帝大悦,“竟从吉言”。隋炀帝继位后,“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萧吉“密言于帝”,以为这是兵祸的预兆,“改葬者,庶可免乎”<sup>[1]1774-1777</sup>。实际上,他深知隋炀帝对杨素心存猜忌,故寻机进言以投其所好。

## 3. 相术类南人代表

韦鼎,“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刺,尤善相术”,早与杨坚结交,“初,鼎之聘周也,尝与高祖相遇,鼎谓高祖曰:‘观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监深远,亦非群贤所逮也。不久必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公相不可言,愿深自爱’”。陈亡入北,隋文帝“待遇甚厚”,多有咨询。如隋文帝为兰陵公主选婿与更易太子,皆有顾问<sup>[1]1771,1772</sup>。

## 4. 医术类南人代表

姚僧垣,姚最父子,姚僧垣“年二十四,即传家业。仕梁为太医正”。江陵沦陷,姚僧垣被俘关中,为北周诸帝及王公疗疾,多有效验,周武帝呼之为“姚公”,开皇三年(583年)卒。姚僧垣“医术高妙,为当时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纪”。其次子姚最,“年十九,随僧垣入关。明帝盛聚学徒,校书于麟趾殿,最亦预为学士”,“始受家业,十许年中,略尽其妙”。入隋,官至蜀王杨秀府司马<sup>[2]2977-2980</sup>。

许智藏,“智藏少以医术自达,仕陈为散骑侍郎。及陈灭,高祖以为员外散骑侍郎,使诣扬州。会秦孝王俊有疾,上驰召之”,“及智藏至,为俊诊脉,曰:‘疾已入心,郎当发痼,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数日而薨。上奇其妙,赉物百段。炀帝即位,智藏时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辄令中使就询访,或以辇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为方奏之,用无不效”。许澄,《隋书·许智藏传》载,“宗人许澄,亦以医术显”,其父许奭,“与姚僧垣齐名,拜上仪同三司。澄有学识,传父业,尤尽其妙。历尚药典御、谏议大夫,封贺川县伯。父子俱以艺术名重于周、隋二代”<sup>[1]1782,1783</sup>。

## 5. 舆服类南人代表

何稠,“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何)妥入长安”,“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度”。隋炀帝继位,责令何稠“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涉及黄麾人仗、车舆辇辂、皇后

卤簿、百官仪服诸方面。何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隋炀帝征讨高丽,建辽水桥,“二日而就”,又速成“六合城”,“高丽望见,谓若神功”<sup>[1]1596-1598</sup>。何稠是大业间最得隋炀帝宠信的营造人物。

### 6. 钟律类南人代表

何妥<sup>①</sup>在西魏灭江陵后入北,善钟律,涉及礼乐,但乐律颇涉术伎,何妥为伎人出身,虽历任学官,但参“掌天文律度”,又参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等<sup>[1]1709-1715</sup>。何妥参与隋初历法之争,支持刘孝孙历,《隋书·律历志中》载,高祖“以问国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与(张)宾历比较短长”<sup>[1]429</sup>。

万宝常,其父万大通随王琳附齐,图谋南归被杀。万宝常“被配为乐户”,有乐律之长,“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sup>[1]1783-1785</sup>，“宝常声律,动应宫商之和,虽不足远拟古人,皆一时之妙也”<sup>[1]1786</sup>。

毛爽,隋文帝平陈,“遣晓音律者陈山阳太守毛爽及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作《律谱》”<sup>[1]391</sup>。毛爽籍属荥阳,为江左音律世家<sup>②</sup>。

此外,其他入隋南朝士大夫多参与雅乐之事,如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制诏吏部尚书、奇章公弘,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洗马柳顾言,秘书丞、摄太常少卿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征等,更详故实,创制雅乐歌辞”。大业元年,隋炀帝“又以礼乐之事,总付秘书监柳顾言、少府副监何稠、著作郎诸葛颖、秘书郎袁庆隆等,增多开皇乐器,大益乐员,郊庙乐悬,并令新制”<sup>[1]359-373</sup>可见南人士大夫代表许善心、姚察、虞世基、毛爽、刘臻、柳顾言、何稠、诸葛颖等,皆曾参预雅乐声律、清庙歌辞的“详议”与创制。

由以上考叙,可见入隋南士从事术艺伎数之业者颇众,形成了一个具有地域特征的术艺群体,诸人活动所涉,不仅几乎涵盖了隋代盛行的术业诸领域,而且凭借其技能得宠于隋统治者,以至参决军政,影响甚著。

## 二、入隋南人术艺化群体之特征

作为具有一定地域性关联的入隋术艺化南士群

体,根据上述诸人的基本状况,这里就其相关活动所体现出的社会特征,特别在推动南艺北输与南北文化融通方面的作为与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 1. 术艺化南人之门第身份、社会地位及其文化特征

上述诸人入隋后以术业为务,就其门户出身而言,诸人虽有寒门与士族之别,但以南朝士族人物为多。就其仕宦取向而言,不仅一些原本在南朝具有术业经历的寒门人物延续旧业,而且众多士族人物术艺化,不循仕宦之正途。出自寒门之术艺之士,太史属员高智宝、太乐属员蔡子元、于普明等人在陈已有相关经历,诸人门户身份失载,当出自寒庶。耿询,从其在陈朝“以客从东衡州刺史王勇于岭南”,万宝常为入北武人后裔,二人亦当为寒人。何妥出自异域,先人“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何妥始初涉学,游学国子,<sup>[1]1709,1710</sup>然“以技巧事湘东王”,后以其聪明而“召为诵书左右”,入隋而得预儒林。其侄何稠,父“善斫玉”,本人自少“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sup>[1]1596</sup>。可见何氏叔侄在南朝当无门第凭借,亦当为寒门。以上诸人在南朝皆出自寒庶,多以伎能显,入北后虽取得朝臣职位而士大夫化,然其行事依然主要关涉术业。

入北南人之“术艺化”,主要是指那些入北后以术艺“干没自进”“干没荣利”的南朝士族人物。吴兴姚僧垣、姚最父子,新野庾季才、庾质父子,陈郡袁充,关中杜陵韦鼎、荥阳毛爽、高阳许智藏及其宗人许澄等,皆具有南朝士族门第背景,有的还有汉魏旧族渊源。仔细考量出自南朝士族之术艺化人物,如庾季才、许智藏、许澄、韦鼎、毛爽、周坟、袁充等,皆为江左侨姓;从门第等次看,或出自尚武次等士族,或为边境豪族之后,或为梁陈之际的新兴家族,即便门第较高者,也或因侨寓地域,或因任职履历,长期居于荆雍等西部州镇,其门户地位、个人声望与建康清贵显达存在一定的身份差异,故所谓“江南望族”云云,过于笼统含混。

至于姚僧垣,是“吴太常信之八世孙”<sup>[3]839</sup>,虽为江东“吴姓”旧族,但吴兴姚氏本为“小族”,自孙吴之后少有人物,直到陈朝姚僧垣子姚察以才学显,位至宰辅,门望稍振<sup>③</sup>。姚察、姚思廉父子入隋,其家族成为吴姓士族代表。吴兴姚氏可谓南朝后期兴起的“新出门户”。究其家族在梁陈之际振兴缘由,

直接因素在于姚察祖姚菩提、父姚僧垣以医术侍奉萧梁内廷。

就以上诸士族人物之家族文化而言,其家学传承与个人素养皆具有术艺因子,这体现出南朝士族社会崇尚博通之学风。如庾季才“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韦鼎“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刺,尤善相术”,袁充“性好道术,颇解占候”,周坟在陈职掌太史,有其家学渊源,乃父周弘正以儒、玄著称,“博物知玄象,善占候”<sup>[4]305</sup>。许智藏、许爽、许澄、姚僧垣等,皆世传医术。毛爽,家传律历之学,其自述云:“臣先人栖诚,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纪,颇达其妙。后为太常丞,典司乐职,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并以闻奏。诏付大匠,依样制管。”<sup>[1]396</sup>由此可见,毛爽父“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并在南朝“典司乐职”,故其律历之学兼采江左诸名家,可谓南朝之结晶。很显然,诸人在南朝皆有术业传承,形成了相关家学传统。南朝士族社会崇尚儒玄,文史兼综,这是其主流学术文化风尚,在政治上士族子弟具有仕宦特权,故除姚僧垣之外,诸人在南朝大多不屑以术伎相炫,也不可能以此求取仕进。然而,南方士族名士多被俘或应征入北后,诸人或被动或主动地以术业为务,成为当时入北南人的一种群体性选择,即所谓“术艺化”现象,这与其入北后社会地位的变化相关。

## 2. 术艺化南人之官职封爵与物质奖赏

入隋术艺化南人相关表现颇为积极主动,隋统治者多有提携与奖赏。在这方面,隋文帝优待韦鼎可谓典型。韦鼎入隋,隋文帝亲自召见,授上仪同三司,出刺光州,“待遇甚厚”,且预“公王宴赏”,实属破例。特别是隋文帝以韦鼎南徙而疏离正宗,“命官给酒肴”,遣杜陵韦氏宗主韦世康携其返乡,重修宗族谱牒,使其享有“百世卿族”之尊荣<sup>[1]1771,1772</sup>。

总体而言,诸人凭借术艺技能,在隋代不断获得官职拔擢和爵位封赏。在职官方面,诸人之本职多为术业吏职,如庾季才父子、袁充等人长期执掌太史,姚僧垣、许智藏、许澄等皆为御医,然隋廷通过加官等方式提升其官职品位,使其享受朝臣待遇。在爵位方面,何妥、庾季才、姚僧垣在北周已有封爵,入隋后增封。如姚僧垣位至郡公,姚最袭父爵,许澄受封县伯。这类爵位封赏,对于流寓之南人而言,提高了其社会身份地位及待遇。需要强调的是,一些术

艺化南人受到超常拔擢,何妥、何稠等以寒门身份获得显爵要职,这虽与北朝门户观念相对淡薄有关,也与他们“干进务人”的相关表现有关,尤其是袁充,隋炀帝时一再破格拔擢,以至“超拜秘书令”<sup>[1]1612</sup>,位列宰臣。

除职官爵位得以提升外,他们还会获得巨额奖赏。如庾季才,隋文帝时受赏三次:襄助代周,“因赐杂采五十匹,绢二百段”;议论迁都,“赐绢三百段,马两匹”;撰《垂象志》《地形志》等,“赐米千石,绢六百段”<sup>[1]1766,1767</sup>。萧吉,开皇十四年进“五庆”祥瑞,隋文帝“赐物五百段”<sup>[1]1775</sup>。许智藏,隋文帝命其为秦王杨俊诊治,“赉物百段”<sup>[1]1783</sup>。袁充受赏尤多,隋文帝“赏赐优崇,侪辈莫比”,“前后赏赐将万计”<sup>[1]1611,1612</sup>。再如许善心,开皇十六年“制《神雀颂》”,隋文帝甚悦,“因赐物二百段”<sup>[1]1425,1427</sup>。

## 3. 术艺化南人群体之投机性与佞幸化

作为“亡国之余”的南朝流迁人士,他们普遍具有寄寓人群的相关心理与性格特征,从上述术艺化南人群体的相关情况看,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典型。如庾季才以天象助隋文帝代周及迁都,隋文帝叹其“是何神也”,表示“自今已后,信有天道”,且“不欲外人干预此事,故使公父子共为之”<sup>[1]1766,1767</sup>,确立其宠信地位。其实,所谓神异之术,无非揣度君主心思,曲意以承奉其旨。《通鉴》载庾季才“劝隋王宜以今月甲子应天受命”,胡三省注曰:“庾季才持正于宇文护擅权之时,而劝进于杨氏革命之日,巫史之学自信其术耳,非胸中真有所见也。”<sup>[5]5535,5536</sup>这揭示了庾季才“自信其术”以投机的本质。

关于入隋术艺化南人群体在政治上主动投机以寻求依附之特点,由诸人对隋文帝废立太子一事的表现即可说明,其中尤以萧吉算计最精,堪称典型。萧吉“见上好征祥之说,欲干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他交结杨广,杨广得立后谓之曰:“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sup>[1]1774-1776</sup>与此相似,隋炀帝时,庾质以子庾俭事齐王,隋炀帝谓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儿事齐王,何向背如此邪?”<sup>[1]1767</sup>由于隋炀帝长子元德太子早死,齐王杨暕一度众望所归,成为继嗣人选。隋炀帝斥责庾质“不能一心事我”,虽出于猜疑过甚,但庾质父子

之行事确实不无见风使舵的投机与依附心态。作为流寓术士,其荣辱完全在于君主之态度,这就决定了他们对权势者的依附性<sup>④</sup>。

确实,就术艺化南人代表行事作风而言,诸人对隋主多应声附和、承奉旨意,少有儒学士大夫之立场与原则,扮演着佞臣的角色。在这方面,何稠颇为典型。何稠揣度并迎合炀帝心意,在改易舆服制度、营造行殿器械等方面,“善候上旨”,极尽奢华铺张之能事。更为典型的是袁充,他对隋文帝废立太子、改易历法诸事,无不刻意揣度上意,“希旨”进言,以至“上大悦”而深得宠信。对隋炀帝大肆兴造、巡游、东征等军政举措,袁充无不“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sup>[1]1610,1613</sup>。何稠、袁充所为,实属佞幸。

当然,入隋术艺化南人并非都是佞臣,也有对重大军政事务以术数相谏者。如庾质,“操履贞慤,立言忠鯁”,当隋炀帝以亲征高丽之事相询时,他皆有谏阻之言,当隋炀帝巡游东都时,他劝阻道:“比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毕力归农。”<sup>[1]1767,1768</sup>再如耿询,也曾谏阻隋炀帝出征辽东,以为“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sup>[1]1770</sup>。不过,像庾质、耿询这样违逆隋君主之意而力谏者,在术艺化南人群体中仅此二例。

#### 4. 术艺化南人之地域群体意识

入隋南人术数之士人数较多,构成隋代术业之士中一个地域性群体,其活动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质。庾季才表现颇为典型,“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没为贱。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太祖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庾季才在周、隋之际入北南士群体中颇具声望,“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邪王褒、彭城刘焯、河东裴政及宗人(庾)信等,为文酒之会”<sup>[1]1765-1767</sup>。庾季才组织南朝名士群体雅集,既显示出其因“术艺化”所获得的特殊地位,也透露出庾季才与其他入北南士的南朝文化趣味。

入隋术艺化南人之活动显现出地域群体意识的自觉,可由耿询的相关经历窥其端倪。耿询被俘入隋,随“故人”高智宝“受天文算术”,耿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使智宝外候天时,合如符契”。二人相互协作,可谓隋廷天文方面的一对南人组合。何稠也一再护佑耿询,隋

文帝曾将耿询“赐蜀王秀,从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废,复当诛,何稠言于高祖曰:‘耿询之巧,思若有神,臣诚为朝廷惜之。’上于是特原其罪”。大业七年,耿询谏阻炀帝东征,“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谏得免”<sup>[1]1770</sup>。耿询、高智宝与何稠皆为南来术艺人士,相互间既有术业合作,也有拯救危难之举,体现出南人术士群体的地域意识。

#### 5. 术艺化南人群体之转输南学

自西魏灭梁以来,入北南朝术艺人士甚众,隋统治者借之转输南朝术艺。诸人在具体术业活动外,多受命进行相关著述与总结。在阴阳卜筮堪舆方面,萧吉“著《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二十卷及《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版要诀》一卷,《太一立成》一卷,并行于世”<sup>[1]1777</sup>。在医药方面,姚僧垣“参校征效者为《集验方》十二卷”<sup>[2]2979</sup>。《集验方》是对其自身及其家族医药实践的总结,有助于南朝医术之北传,同时也应吸收中土医药的成就,有助于南北医药文化的汇集与整合。在天文星占方面,庾季才撰“《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又与其子撰“《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并行于世”<sup>[1]1766,1767</sup>。这无疑是南北朝星占术数的集成性著述。耿询则撰有《鸟占情》<sup>[1]1770</sup>。

隋文帝灭陈后,将南朝天文观测仪器征调关中,并利用南朝的天官人员与器物,刊定天官舆图,形成“正范”。“高祖平陈,得善天官者周坟,并得宋氏浑仪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参校周、齐、梁、陈及祖暅、孙僧化官私旧图,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准三家星位,以为盖图。旁摘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黄二道,内外两规。悬象著明,缠离攸次,星火隐显,天汉昭回,宛若穹苍,将为正范。”<sup>[1]504,505</sup>不仅如此,入隋南人对天文器物有所改制与新创。如袁充曾制造刻漏器物,“至开皇十四年,鄜州司马袁充上晷影漏刻”。耿询对天文器物“创意”颇多,“大业初,耿询作古欹器,以漏水注之,献于炀帝。帝善之,因令与宇文恺,依后魏道士李兰所修道家上法称漏,制造称水漏器,以充行从。又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于东都乾阳殿前鼓下司辰。又作马上漏刻,以从行辨时刻。揆日晷,下漏刻,此二者,测天地,正仪象之本也”<sup>[1]527-529</sup>。

隋廷还以南人培训天官人员。如隋文帝命周坟培训“太史观生”,“自此太史观生,始能识天

官”<sup>[1]520</sup>。隋炀帝则以袁充传授星象之学,“炀帝又遣宫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别诏袁充,教以星气”<sup>[1]505</sup>。由周坟、袁充从事“教习”以转输南朝天文星象术学,可以说隋廷天官系统一定程度上“南朝化”了。

在钟律方面,入北南朝术艺人士推动了隋代律历、音乐等制度变革,其中江左声律世家人物毛爽等作用显著,“爽因稽诸故实,以著于篇,名曰《律谱》”<sup>[1]396</sup>。此外,影响较著者还有万宝常,“开皇十年万宝常所造律吕水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厘。今太乐库及内出铜律一部,是万宝常所造,名水尺律”<sup>[1]408</sup>。

钟律关涉音乐典制,隋统治者借入北南人以转输南乐,以求完备。如何妥,《隋书》本传载其上表云:“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何妥录梁乐人所传之“三调”“四舞”,创作歌辞,隋文帝“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sup>[1]1714,1715</sup>。隋平陈后,南乐北输渐入高潮,《隋书·音乐志下》载:“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太常牛弘奏曰:“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晋王杨广后又奏请,隋文帝“乃许之”。可见隋对“宋齐旧乐”“梁家雅曲”和“陈氏正乐”加以修缉,“以备雅乐”<sup>[1]349</sup>。据《隋书·律历志上》记载,“开皇初,诏太常牛弘,议定律吕。于是博征学者,序论其法,又未能决。遇平江右,得陈氏律管十有二枚,并以付弘”。当时毛爽等人受命作《律谱》,“因遣协律郎祖孝孙,就其受法。弘又取此管,吹而定声。既天下一统,异代器物,皆集乐府,晓音律者,颇议考核,以定钟律。更造乐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与朝贤听之,曰:‘此声滔滔和雅,令人舒缓’”<sup>[1]391,392</sup>。可见隋文帝以毛爽传南学,“定钟律”。

由上述可见,入隋术艺化南人群体在各术艺领域,无论其具体实践活动,还是相关理论总结,都表现出转输南术与融通南北的旨趣,这是由其所处之时代决定的。隋终结数百年南北分裂局面,开启了南北社会及其文化融合之趋向,江左术数文化日渐北传,自属当时南北社会及其文化融通与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入隋南人术艺化之缘由

自汉代以来,人们普遍崇尚儒家经学义理,鄙薄术艺技能。南北朝后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将书法、绘画、射技、卜筮、算术、医方、琴瑟、博弈诸事归为“杂艺”,虽不无游心娱目之效,但绝不能以之安身立命,即便对与士大夫文化紧密关联的书法,也明言可“微须留意”,然“此艺不须过精”<sup>[6]</sup>。颜之推所言,体现出士族社会普遍的文化观念。考察入隋术艺化南人群体之境遇,体悟其心态,他们之所以做出如此人生抉择,当与其入北后人生遭际及隋统治者之相关崇尚密切相关。

#### 1. 入隋南人遭受歧视,故以术艺“干没荣利”

南朝士大夫以战俘身份入北,大多丧失以往优越的政治地位与家资产业,受到歧视与虐待,甚至多有被降为奴隶的情况。魏恭帝元年(554年)十一月,“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sup>[3]36</sup>。隋灭陈,“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sup>[1]612</sup>。开皇九年“三月,己巳,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sup>[5]5620</sup>。萧梁上层人士,也多受歧视与压制,如宇文氏统治集团对王褒、庾信等名士,虽表面优宠,内心则“视之蔑如”,“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sup>[3]844</sup>。

入隋后,这类自江陵北迁及废后梁入隋之南士群体,相较陈亡后入隋南人,其政治与社会地位虽有所提升,但由于地域社会文化观念和士风取向等诸方面的差异,依然受到北人的歧视与排斥。如柳庄作为后梁重臣,早与隋文帝交结,“苏威为纳言,重庄器识,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柳庄。’高颉亦与庄甚厚”。柳庄出自河东柳氏,寓居雍州,为南朝边境豪族人物,其学行与北方人士相近,受到关中大家族代表苏威等人的赏识,可谓例外,苏威所言体现出关中旧族对南人总体轻视的态度。实际上,入北南人中的干能之士往往受北人排斥。柳庄“与陈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见上及朝臣多属意于庄,心每不平,常谓庄为轻己。帝与茂有旧,曲被引召,数陈庄短。经历数载,潜诉颇行”<sup>[1]1552</sup>。柳庄因此失爱于隋文帝而被外任。又,柳彧亦出自侨寓雍州之河东柳氏,任治书侍御史,“当朝正色,甚为百僚之所敬

惮”,隋文帝称“柳彧正直士,国之宝也”,然关中权贵杨素利用蜀王杨秀案嫁祸柳彧,“及秀得罪,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sup>[1]1483,1484</sup>。柳庄、柳彧等边境豪族代表人物在关中社会根基相对薄弱,故而在政治斗争与人事纠纷中难免受到中伤。

陈亡后入隋南人大多遭受压制,迁转不畅。如蔡征为陈开国重臣蔡景历子,隋文帝“闻其敏贍,召见顾问,言辄会旨,然累年不得调”<sup>[4]393</sup>。蔡征受到隋文帝重视,依然“累年不得调”。又,陆知命助杨广招抚江南反叛,“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但仍然难得信任,“数年不得调”<sup>[1]1560</sup>。与此相关,入隋南士群体生活颇为困窘。如江左名士徐陵弟徐孝克,“陈亡,随例入关。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为粥,不能常办”<sup>[4]338</sup>。沈光,“父君道,仕陈吏部侍郎,陈灭,家于长安”,“家甚贫窶,父兄并以佣书为事”<sup>[1]1513</sup>。虞世基,“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sup>[1]1512</sup>。

入隋南人多出自江左侨旧士族,普遍受到关陇集团的排斥与压制,仕宦不畅,以致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面临如此窘境,他们寻求改变生存状况,于是多有以术艺依附隋统治者之表现,甘为争宠牟利之佞幸。可以说,入隋南人之术艺化,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做出的无奈应对之举。

## 2. 隋统治者“雅好符瑞”,南人“矫其迹为悦媚”

隋统治者重视术数,“雅好符瑞”。如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初帝既受周禅,恐黎元未愜,多说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进者,不可胜计。”<sup>[1]117</sup>“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象,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sup>[1]420</sup>及至开皇、仁寿之际,符瑞之风甚嚣尘上,盛极一时,唐太宗曾谓侍臣曰:“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劼著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以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sup>[7]</sup>隋炀帝也“好祥瑞”。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唐太宗“常笑隋炀帝好祥瑞”,可见杨广崇尚符瑞之影响。杨广施政,多援引术士以为顾问,因

此才有袁充等人一再参与军政谋划与决策的事例。

隋统治者“雅好符瑞”,成为隋代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符命造作与术数之学关系紧密,一些南来人士凭借其术艺之学参与其事,表现出明显的投机性,庾季才父子、萧吉、袁充、韦鼎等,无不如此。前引萧吉“见上好征祥之说,欲干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袁充深知隋文帝有废太子意,“见上雅信符应”,因而进言,“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sup>[1]1610</sup>,这是术艺化南人“希旨”投机之典型。又开皇年间万宝常参与作乐,为关中旧族代表苏威、苏夔父子排抑,苏威问其“所为何所传授”,“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命,有言征祥者,上皆悦之。先生当言就胡僧受学,云是佛家菩萨所传音律,则上必悦。先生所为,可以行矣’”<sup>[1]1784</sup>。这体现出南人不得已而“言征祥”。由此可说,隋代政治文化生态催生出这一独具时代特征的南人术艺化现象。

## 结 语

综合上述,至隋灭陈后,自南北朝后期以来南朝相继入北人士皆归于隋。考察入隋南人之境况,可见多有以术艺“干荣利”者,即所谓入隋南人之“术艺化”。其中代表人物如袁充、庾季才父子、萧吉、韦鼎、许智藏、周坟、毛爽等,皆出自南朝“侨姓士族”,姚僧垣、姚最父子则出自江东旧族。魏征论袁充,称其“委质隋朝,更以玄象自命”,“江南望族,干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其中固然出于儒家的正统观念,对入隋南人术艺化人士之品节表示鄙视,但也揭示了这一群体在仕宦途径与生活方式上所做出的自觉选择。就其术艺活动而言,天文星占、阴阳卜筮、相术、医药、舆服营造、钟律等当时盛行之术艺皆有涉及。由诸人之进言议事,主要聚焦于隋文帝代周、建新都、改易太子、为独孤后择墓与隋炀帝继位、东征高丽及其后期民变诸事。在相关事件中,术艺化南人群体在政治上普遍表现出揣摩上意,以其术数附会而助成其事,目的在于争宠求进,显示其政治品格的依附性与佞幸化的特质。当然,客观而言,隋统治者对南人术士的钦重,在南北政治统一后致力于文化整合的背景下,诸南人术士多有汇集术数,转输南艺之表现,特别在天文、钟律等领域,颇有成效,有助于南北文化之融通。至于入隋南人不惜“颓其家声”,甘于“得不以道”,主要在于南人入

北后沦为“亡国之余”，政治上遭受歧视与排斥，致使他们生活困窘，而隋朝统治者“雅信符瑞”，以术数缘饰其立国与统治，从而诱引入隋南人以术艺而“干没自进”。

#### 注释

①与其他术艺化人物相比，何妥入《儒林传》，所涉多为乐事，谓其“术艺化”，似不甚典型。然《隋书》本传载其“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与关中苏威、苏夔父子等人相互攻讦，多有是非，故《隋书》卷七五传末“史臣曰”称“何妥通涉俊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词笔，然讦以为直，失儒者之风焉”。可见作为儒者，何妥颇“另类”。他在萧梁本以技能为吏职，有术士经历。至于何妥之学术修养，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六说：“何妥以儒自命，至其隔碍不通，自为胡越，则人心之可畏如此。”卷三七又云：“至何妥显行馋贼，排贤害正，自为乱德之首，岂儒固使之耶？泛观后世，学衰道失，士亦无不然者。”又以其论《易》而为杨伯丑所笑，称“妥，鄙儒也，曾不能传其一二，使后有考焉，为可惜也”。可见叶适对何妥为学与为人颇为轻鄙，以“鄙儒”视之。参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第540、555、556页。②据《律谱序》可知，毛爽兄为陈吏部尚书毛喜。《陈书》卷二九《毛喜传》载：“毛喜字伯武，荥阳阳武人也。祖称，梁散骑侍郎。父栖忠，梁尚书比部侍郎、中权司马。”见姚思廉：

《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388页。晋宋之际，荥阳毛氏家族人物多以尚武著称。此外，关于毛爽父名，《陈书》载“栖忠”，《隋书》卷一六《律历志上》录毛爽《律谱序》则为“栖诚”，当《隋书》避隋文帝父杨忠讳而改，应从《陈书·毛喜传》所载为是。③《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载，陈后主以之为吏部尚书，姚察一再上表谦让，甚至垂涕自称“臣东皋贱族，身才庸近”云云。见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351页。姚察自谓“贱族”，固为谦称，但从南朝士族社会的传统观念而言，姚氏确实门户相对弱小，人物不盛，加上其祖父的医士身份，确实难称清显。④术艺之士普遍具有投机性，不唯入北南人如此，出自北方者也大多如此。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六论及隋代张宾、张胃玄、刘焯、袁充等有关律历之争，有论云：“然方其时，君蔽臣谄，往往诬天席宠以售其术，如历差日长之类，固步足凭；而焯为儒者，乃与之较是非耶！”参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第541页。

#### 参考文献

- [1]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2]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3] 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 [4] 姚思廉. 陈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6]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567, 597.
- [7] 谢保成. 贞观政要集校[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521.

## Gain Benefits Through Improper Channels: The Phenomena,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Southerners with a Tendency of Technicality in the Sui Dynasty

Wang Yongping

**Abstract:** Among the southerners in the Sui Dynasty, many people engaged in various technicalities were a special and active group. Among divination, medicine, music, and facial techniques, there wer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wh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Emperor Wen and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They speculated about the emperor's intentions, and their political roles tended to be sycophants, so they received higher treatment. They introduced the skills of the South to the North, which w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North and South cultures. Most of these people engaged in technical work were from the gent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The main reason why they could not obtain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through proper channels was that their status as survivors of national subjugation was suppressed by the nobles in Guanzhong and Longshang. Emperor Wen and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believed that the heaven showed signs corresponding to personnel, which led some southerners to speculate for profits.

**Key words:** the Sui Dynasty; southern subjugators in the Sui Dynasty; tendency of technicality

责任编辑: 王 轲